



知识境遇与前沿意识

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
讲述话语的年代。

——米歇尔·福科

第一章 跨世纪文化：

当代语境与问题意识

我们往往震撼于世界的陌生和瞬息万变，又不得不痛苦地习惯于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自我身份的改写。

9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似乎都是一个由“大”到“小”、由“雅”到“俗”的时期。就西方而言，有罗蒂的从大哲学到小哲学之说，有哈贝马斯的从大写真理到小写真理之说，有福科的从大写的人到小写的人之说，有洛奇的从大世界到小世界之说，有利奥塔德的从大叙事到小叙事之说，有新历史主义的从大历史到小历史之说，有后殖民主义的从大写话语到小写话语之说。这种由大到小、由雅到俗的发展趋势，指明当代话语语境的变迁和游戏规则的重设，并使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问题，共时态地横陈于中国学者面前，使任何终极性的问题解决变得不可能。

在商业与权力的合谋中，在科技“克隆人”不断爆出冷门的哄动效应中，90年代的文化在世纪末的冷风景中成为一个“时代征兆”，并在一系列根本性转型中显示出嬗变的历史那充满吊诡的“踪迹”。

第一节 90 年代文化脉动及其阶段分期

90 年代中国当代文化精神不仅集中体现在思想学术、知识型的语言学转向上，而且也表征在文化批评、当代传媒和审美文化的兴起上。对这一转型发生的历史语境、基本走向、价值归属进行研究，具有当代学术史思想史地基清理的意义。

90 年代在不同的人的分析框架中可以分为不同阶段，在我看来，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 思想转型的初始阶段（1989—1992 年）

从 1989 到 1992 年初期，气功型“宗教热”成为民间意识形态，而与中心意识话语共享民间意识空间。事实上，就思想资源而言 90 年代紧接 80 年代思潮而来，尤其是 1989 年后整个政治转型——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 90 年代初期思想处于一种低调状态。所以，将 1990—1992 年称为思想沉闷时期，大抵不会有错。其特征为意识话语中心化，政治两极情绪化，学术回归古典化。这一时期，不少学者退回书斋闭门读书，民间出现了罕见的气功热。因此，有人亦称为“气功意识形态”时期。

二 多种价值的骚动阶段（1992—1997 年）

这几年中的每一年又显现出不同的光谱。1992—1997 年无疑是 90 年代的主体性构成。这几年，思想进入多元开放范

式，经济进入全民经商模式，文化出现世俗骚动和个体化倾向，整个中国成为一个充满欲望活力、充满机会和刺激的“场域”。每个人、每种思想、每种活法都在这历史瞬间转换的舞台上，匆匆往来后又迅速替换消逝。

1992年邓小平南方考察以后，出现了新的历史契机，即由意识形态中心化转向了商品经济多元化，经济成为这个时代的骄子。因此，似可把1993—1995年的经济暴热称为“商品话语与大众媒体的狂欢时期”。其特征为：经济上商品具有政治话语的权力，横向挪用西方现代经济理论，现代化成为当代中国的新神话；文化上全面张扬欲望，反现代性和反现实主义性，同时全球眼光与本土意识萌发；文学上出现迷惘的文坛与困惑的创作批评，文学商品话语和文化媚俗化，批评主体解体，传统文学主题失效，读者群体分流，文艺标准失落和规范失序；思想上是多元观取代了绝对主义观，开放多元的心态取代了焦躁的二元对立心态，其结果是话语空间拓展和自由度逐渐变宽。

1993年在文化坐标上是“欲望膨胀”和“价值倾斜”的一年，是政治沉重感被经济腾飞感剥离的一年。一大批边缘人和淘金冒险者敢为天下先，利用两种制度的“时间差”，一夜之间走进了先富起来者的行列。而后富或后不富者们则沉醉于“是否应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应当让谁先富起来”的无尽争论中。社会经济秩序失衡，暴富和捞一把成为1993年最大的金钱想像，而政治想像和文化想像终于让位于金钱想像这位后来居上者。文人们只能退守蜗居，打出了“重建学术规范”的旗号而与经济热潮保持距离。其中，面对下海的引诱和拒绝的痛苦，置身于金钱世界之中的无力感溢于言表。有些文人在金钱股市“热

与学术规范“冷”之间选择了第三条路，即性文学热——以《废都》^①为标志的陕军东征，成为世纪末性文学的观念先锋。

1994年实为“文化论战”的一年。人文精神的大旗分别由作家“二张”和上海学人高举，其争论的实质在于当代人在“现代化陷阱”和“现代化神话”之间何去何从。张承志选择了“荒芜英雄路”，张炜选择了“我宁愿不要这样的现代化”，上海学人选择了人文理想精神。^②而争论的另一方“二王”（王蒙和王朔），则在现代化神话下走进了利益趋动的现实原则，为社会的每一点进步叫好，并批评注重价值坚守的人文精神的保守落后。但这种文化论战的力度仅限于文人世界，因为关于“现代化的代价和陷阱”的争论，并不影响雅皮士、文化商人、反文化英雄们在所谓经济暴发之路满地溜达。

1995年是“平庸过渡”的一年，也是“东方主义”十分兴盛的一年。大造声势的电视剧《三国演义》，使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成为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市民文化的谈资，而其文白夹杂的对白却使得文人们津津乐道古典“文化财”；“反法西斯纪念热”对法西斯霸权的清算，引发了历史反思和时代警惕之心，但不足之处在于某种程度上有扩大化（反西化）之感；“世妇会”使边缘话语一时成为中心话语；东亚经济的泡沫性扩张使人们不再讨论西方价值，而热衷于讨论“东方崛起”和21世纪“亚洲价值”的重要地位。

贾平凹著《废都》，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

^② 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还可以参看张岱年等著《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畅广元主编《中国文学的人文精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朱红文著《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唐君毅著《人文精神之重建》，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

1996 年是“文化退守”和“世俗化”的一年。国学热在主流意识话语支持下达到高峰，祭孔活动、国学书市热、中国历史名人“传记热”、“说不”丛书的民族主义热、晚生代小说、新市井小说的世俗趣味，构成 90 年代东方主义主潮，反精英的民粹主义获得了全面胜利的自我满足。1996 年是知识分子“精神分化”的文化低迷时期，其特征是精神维度深层次的彻底分化，思想观念演变以及对 80 年代问题的反向式逆转——文本试验由先锋性退回到当下保守性，创作意向由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退回到对小男人小女人文学的热衷，批评立场由群体性、理想性退回到个体世俗性。先锋的衰落与边缘化、新现实主义重新崛起、后现代文化的横向挪用、“文本政治”化书写中国和世界成为这一年文化问题的大致风向标。

1997 年邓小平的辞世（2 月 19 日），使得这一年成为“充满风险意识”的一年。改革前景的忧虑（春天）、香港回归的兴奋（夏天），亚洲经济危机的肇端（7 月 2 日），克隆羊技术的震惊（秋天），使得国人要求稳定的意识空前突出。但是，先锋艺术的全面市场化、拍卖化、文坛“马桥事件”为代表的“文坛官司”为这一年带来了些嘈杂之音。看客与被看的表演都已不再是文化风景线，而是经济泡沫消散之前的文化泡沫，也是巨型金钱想像破灭之后的巨型文化想像内缩的征兆。

纵观这五年，从中国经济神话到全球金融危机，从信息高速公路到克隆技术的伦理问题，从人文精神到文坛官司，从真正诗人的自杀到散文化的小男小女风景，文化精神确实是发生了全面转型。认真而全面地审理这一转型的正负面效应，当是刻不容缓的了。

三 跨世纪的临界阶段（1998—1999 年）

1998 年是“多事之年”。网络热再造了一个加入世界行列的虚幻景象。中美首脑分别到哈佛和北大讲演，人们对北大百年校庆的热闹尚记忆犹新，在感受克林顿在北大现场直播的风采之后，于 9 月中旬又在网上看到这位被称为“因特网总统”的丑闻。中国的大洪水使得 5000 余人丧失生命，全国遭受相当的经济损失。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韩国经济红灯闪烁，俄罗斯卢布贬值总理易主，日本经济滑坡日元贬值，朝鲜饥荒，亚洲局势动荡，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失和，印尼反华运动，这都使“四小龙”经济神话破灭之后，亚洲总体形象出现危机迹象。

这一年学术思想上一个重要信号，是“人文科学”进一步让位于“社会科学”，并日益被挤向社会思想的边缘。近期出版的“学术前沿丛书”是社会学、法学、经济学、人类学之类的书（知识经济学热潮），文学、美学、哲学进一步处于低迷状态和自说自话处境，这无疑又导致了图书市场的低迷和低俗读物重复的恶性循环。在这种意识形态退隐、精神信仰空白、经济低迷之年，杂色纷呈的“宗教热”动向成为了世纪末新景观。

1999 年的来临，是宗教“热”与世纪末预言相当活跃的一年，是中国大使馆被炸而民族情绪高涨的一年，亦是“跨”的一年——跨世纪、跨国资本，也是受“电脑千年虫”苦恼的一年。可以说到了世纪末，面向“21 世纪的中国”，回顾一个世纪的学术思想并全方位地审理 20 世纪的诸多问题，清理一个世纪的精神遗产并准备跨入下一世纪的临界时期，成为学术界反思的又一轮热门话题。

第二节 多重语境中的问题聚焦

90年代的中国镜像问题，是与一个世纪的中国知识与思想褪皮的根本问题紧密缠绕在一起的。

百年中国，问题纠结。诸如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学术与政治、主义与问题、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全球化与本土化、启蒙理想与后乌托邦、现代化代价与当代人文精神等，使 20 世纪文化史思想史，正在成为问题生成史和话语变迁史。

正是在这千纪年转换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有可能检视一个世纪理论风云中的种种问题，并进而追问中国文化精神向何处去。20 世纪中国与传统中国相比，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在百年间遭到西方文化体系的全面冲击。总体上说，西方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起码三次重大的文化转型^①，即从古希腊的两希精神（古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到文艺复兴时期以降的理性精神，再到 20 世纪的反理性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精神。而中国却延续了两千余年汉语文化形态的单线性时代精神，这一文化精神在 20 世纪初为西方现代性文化所中断。这就使得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之间，中国文化面临总体危机。这一总体危机不仅意味着终极关怀的失落，同时也隐含着价值符号的错位：儒家、道家、佛家三套思想话语，在不断西化的当代人那里出现了与其生存状态和精神寄托中断的裂缝，因而导致新转型学说——新儒家、

^① 参雅斯贝尔斯著《智慧之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 年版。

新道家、新佛家等的出现；而西方基督神学的思想话语资源，与中国人的信仰核心尚存诸多话语冲突之处，难以急切整合。因此，当代中国文化大抵只能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全新融合及当代转型中，重建新的思想话语资源，才有可能使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文化危机得以缓解。^①

在 20 世纪纷纭复杂的背景中，中国文化发生着根本性的断裂和不断重复出现的问题，使问题的审理变得相当棘手。但是如果化约性地加以“现象学还原”，则大体上可以将 20 世纪中国分为五个“话语演进时代”。即：世纪初的 10 年代是晚清的“传统转向现代知识话语时代”；20—30 年代则可称为“自由的学术话语时代”；40—70 年代是“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时代”；80 年代是“诗意的生命感性解放时代”；90 年代则可以称之为“消解的游戏话语时代”。这样，本世纪可以分为“传统—自由—阶级—诗意—消解”五个话语时代的递进，其基本方向是从传统本土话语，走向张扬西学的学术话语。如果这一现象学还原的结果可以成立，那么，五个话语时代的“根本问题”则相当惊人地不断重复出现，并形成愈演愈烈的当代景观和不断变异的话语范型。

一 “主义与问题”的全面审理

90 年代的中国承接本世纪的多种社会思想转化，发生了全面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型。因而我们面对“问题”或“主义”时，有必要弄清“语境”，即我们面对的是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是新问题还是旧问题？是个体的问题还是群

^① 参韦伯著《中国的宗教 儒教与道教》台北，1985 年版；中村元著《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体的问题？是国家民族的问题还是全球性世界性的问题？光找到问题还不行，我们被问题所迷惑、所虚幻化甚至虚无化掉也不行。因此，还要找到“地基”，找到观察问题的立足点和剖析问题的新角度。面对“主义”“审理”问题，即搞清“主义”和“问题”是90年代学术研究和文化批评起码的要求。

“主义”的厘定。80、90年代引入中国的西学“主义”，如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少数话语等“后”“主义”。这些问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钳制互相消解，互相掩盖互相撕扯，并为那些文化批评的误读推波助澜而滚滚向前，使人在“假历史洪流”前遗忘批评家的“批判”意识和“揭底”品格，甚至背对问题而成为“鸵鸟式的批评家”。如何在研究中去正视那些成堆的问题，是切入当代问题的第一道关口。

“问题”的审理。问题相对而言更为复杂，大致可分为以下诸方面：其一，是关于知识分子分化问题。时代在世俗化旗帜中，是怎样使知识分子边缘化而使世俗化成为当代神话的？在学术和思想之间痛苦徘徊的知识分子，怎样走自己的“边缘之路”？究竟应该怎样书写自己的心灵历程？怎样设计自己的预理想目标？怎样看待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自己的精神创造价值呢？其二，是审美文化、大众传媒（或称之为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同知识精英造成了怎样的内在冲突？构成了怎样的张力？双方受到怎样的内在损伤？其三，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出现，带来的关于文化霸权、权力话语、第三世界文化的出路和前景等问题，以及问题的虚假解决现象的历史掩盖条件是什么？后现代主义在前现代的中国，在思维论、价值论和工艺论层面为怎样的“现代性问题”所纠缠？其四，是新历史主义与新历史小说带来的如何评价历史的问题。历史是主观的还是历史是客观

事实？历史在阐释中是被无意误读还是有意误读？被解读为政治意识形态史、权力话语史，还是文化稗史？其五，是关于世纪末文论问题的清理。这一世纪以来文论出现了怎样的假问题？掩盖真问题甚至剥夺真问题是怎样发生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究竟是否应有尺度？应有怎样的尺度？这种尺度是纯粹私人化的还是可通约的？谁在确定尺度？尺度的消解对文学是怂恿还是伤害？其六，是文艺这种感性化形式，怎样在世俗关怀和终极关怀之间找到一条较好的联通之路？它在既不可能“代宗教”，也不可能成为“欲望的表征”之时，如何确立自己的本体？“诗人之死”与散文热潮在当前中国文化中应该怎样定位？批评家的分化和事件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还有，先锋文艺实验的困境和误区何在？其悲壮感、创新意识、革命性和震撼性何在？这些重要问题，无疑都需要认真地审理，需要在作品和理论上的双重透视中，才能正确解答这些网状般纠缠的问题。

二 文化研究的四重语境

90年代的语境呈现出本世纪最复杂的构成，其归纳分梳因不同方法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可谓见仁见智。在我看来，它起码由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四重语境所构成：

传统与本土化。其重要标志是众多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厚积薄发，推出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原始儒家、两汉儒家、宋明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当代显学，传统文化读物成为书市的主流读物。在历史的空场，这种传统本土化的格局无疑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意义，然而，其对西学的强劲反拨又使90年代具有浓郁的非西化意味。

意识形态化。这表征为90年代在消解意识形态阶级斗争

的同时，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话语定式仍然十分强盛，它制约着学术的中心问题、基本发展方向以及讨论问题的基本态度。尽管有些学者将其称之为官方和民间的冲突，但是我认为，从来就没有完全脱离官方的所谓民间，民间仍然不是世外桃源，那里的意识形态性决非可以忽略不计的。

现代性西化。这可以集中体现在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东方主义、女权主义在 90 年代非常活跃的场景上，正是这一场景标明了与传统化相对相生的西化思潮仍然存在 尽管也有《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有多丑》等带有文化民族主义色彩的著作，但西化现代化思潮在 90 年代的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领域，仍然是一种不可忽略的真实语境。

数字复制的后现代化。其体现在大众传媒、英特网、现代电脑全面占领市场且进入中国的话语圈中，数字化生存（甚至数字化犯罪）与后现代诸多的文化生存方式，成为 90 年代一道难以说尽的风景区。

正是这四重语境构成了 90 年代众多话语圈的不同价值取向，而这众多的话语圈彼此之间形成某种经验不可传递性，一种多元而无元的历史文化症候。在这种从超验精神回归个体身体的时代，却遭遇到个体间经验难以交流、难以通约的文化语境，因而每每爆发出火药味极浓的文化论战。

在 90 年代，不管是传统知识、现代知识、数字化生存的后现代知识，都说明理性化的“知识”正在取代过去的感性化的“经验”，而人的脑力正在取代有形资产，高科技正在取代传统性产业。不断充斥的剧烈争论的新知识话语——知识权力、知识社会、知识经济，促成了人与人关系的根本改变，人们因现实日益严酷而变得非常现实而世俗。冷漠成为全球病，地球变成地球

村。人与人之间心灵包裹了如此坚硬的硬壳而难以交流和沟通。在商品原则和社会公正、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引发了“终极关怀”和“世俗关怀”的论战，触发了关于私人化写作的讨论，以及个人化、世俗化的辩论和文化市场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

尽管这多重语境似乎在彼此争论中，互相隔膜，但是整个学术界和思想界却并不愿回到那种一元独霸的中心论时代，而愿在这种多元共生、多音喧嚣之中去获得自我个体应有的立场和地位。所以，在这巨变的时代氛围中，同气连枝，谁也不可能再独善其身，谁也不能对不同的观点和语境加以漠视而自说自话，谁也不可能完全不顾历史的发展和传统的更迭，走向一种极端的自我中心的幻象。

这种由多元取代一元，宽容精神取代绝对精神，彼此倾听互相联系取代了闭门造车的学术思想格局，使 90 年代的学术研究，必须既注意到大众文化崛起中若干合理的因素，也注意到其背后的国家机器权力被遮蔽这一事实；既注意到公用空间日益缩小，私人空间无限膨胀，传媒知识人日益左右当代中国文化领域，又关注其民族主义打着偏激的反西化旗帜，所掩盖若干不为人所注意的落后排外的、自我孤立的一面，同时还注意过分西化的所谓中国的后现代后殖民，抹杀华夏母语经验，抛弃自己传统之根的弊端。如何使我们把握到一个“度”——既非此又非彼，不忽左忽右忽上忽下，而使我们视域深广，胸襟开阔，走得更稳些呢？

在我看来，保持问题的敞开性，不遽下结论，同时对若干问题绝不浮光掠影地轻轻带过或干脆放弃，而是深加挖掘坚持审理，我们才可能面对真正的问题，而杜绝问题的虚假涉猎或虚假解决。

第三节 话语症候分析的当代策略

就根本意义而言，对 90 年代的思考和写作是一种对民族命运的寓言式思考和写作。当精神激情让位于世俗关怀后，思与写的分量无疑将受到挑战。当代中国思想中的所有新思想成分，事实上是与旧思想紧紧地缠绕在一起的。当代人内心充满紧张的冲突，而思想又驳杂荒芜。也许，只有弄清 90 年代学术思想话语的内在冲突，才能看到精神价值汰变所表征的中国文化的当代命运。

在这种问题式的清理中，我以为，尤为重要的方法是进行“话语”(discourses)分析。因为，话语是以最一般和最不确定的方式表示词语性能的整体，它具有有一种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结构，不管是哲学话语、经济话语、知识话语，还是权力话语，我们都可以找到其话语的基本模式，并提出我们的质疑。话语对隐秘意义具有遮蔽性，换言之，某种对象是通过其显露而将自己隐藏起来，同时通过自己的隐藏而在现实中呈现出存在状态。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那些已说出的东西去寻求其隐藏了什么，并进而寻求它们之中有什么东西早已说出，甚至在它们意味深长的默然中所包含的未能说出之意。

话语研究的真实意图在于，去发现某种可能存在的表达和可能有效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说出的事情包含着比它本身更多的含义。言说是一种在“说之中”的“不说”在“不说之中”的“说”的意识潜在运动，通过对其话语言说方式的内在揭示，可以发现权力网络是怎样在它的描述方式中确定自己的运作方位

的，而且怎样去改变并重新区分文化史思想史范围的有效性的。所以，真正学术思想史的魅力在于，其总是对某一特殊话语隐蔽的方式加以系统描述，并进而提出这类问题：某种权力或某种思想通过什么途径得以传播？在怎样的知识群体中流通？为人类的思维勾勒出怎样的远景？强加给人类思想以什么样的界限？在描述一个时代特征时，它们能怎样使其区别于其他的时代？同时，在叙述一种新的或旧的经验思维模式和话语方式的冲突时，怎样去清理那些思想的遮盖物和经验的不可通约性，并进而将被遗忘被压抑的话语展示出来？^①

文化研究并非是一种无边的文化讨论，相反，它注重的关键问题是发现“断裂点”找出时代转型的“裂痕”并上溯到“渊源”或下寻到最新发展“踪迹”。因而 90 年代文化研究，就是进入并处于时代的矛盾螺旋体中，其分析本身就是矛盾，也不绕开矛盾，在变化变形中，从一个矛盾到另一个矛盾，从而以一种特殊范围反映更为普遍的冲突，又在这冲突中去揭示一种富于魅力的、包含整个时代全部知识和思想的基本模式。

思想总是学会拒绝、否定、怀疑，并以此去发现矛盾，揭示多种冲突的新阐释空间。要写出 90 年代的话语转型史和话语症候史，与其说是重视历史的事实、事件或一些细部的具体材料的堆积，勿宁说是更重视一些重要问题的理论梳理和剖析。因此，我在研究中强调史与论的差异，以史作为解剖问题的对象，而重在理论分析，使文化研究的基本意向重在分析型而非描述性。面对 90 年代言人人殊的重大问题和思潮，我以为，不妨在研究

① 参 M. Foucault, "Truth and Power," in *Power 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 - 1977*, ed Colin Gordon. New York, 1989.

中采用新的有效的研究方法和策略。略加说明如次。

一 文化研究话语分析方法的当下策略

将文化研究的‘政治文本’和‘价值阅读’施之于 90 年代文化研究层面，强调在为文化意义所作的阅读中，都力求从某种前提、选择活动、某种存在的判断出发，作出自己隐含的或明确的价值判断，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对当代问题的文化介入。因此，文化文本价值阅读中的价值判断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价值阅读表明了文本是一种文化中的意义载体，有助于再现和表征文化信仰的对象物。

似乎有必要以一种更开放的视野进行 90 年代的文化研究：从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张力场中，把握这个时代什么活着而什么已经死了；从中心消解而边缘文化兴起中，观察意识形态、西学姿态、本土立场三者之间的话语角逐；从文字载体的文化研究转向了影视图像的现代文化的研究中，看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成为热门话题的内在原因；从纯文学研究模式，看转向种族、性别、阶级、民族性、差异性、社区文化、媒介文化、女性文化和后殖民文化等新审理范式；从当代学术研究转型中，形成关于性别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种族文化差异研究、当代影视文化研究、跨国资本运作研究、现代消费文化研究等多种研究意向。在不断置换的问题和话题中，文化研究改写着这个时代的学术观和价值观，进而改变着整个文化的基本走向。

甚至可以说，某一文本就其文化意义而言，就在于破坏其所立足于其间的某种秩序状态，暗示出某种非秩序状态。透视其处身其间的社会秩序以及文本以外的任何其他的秩序网络，使文化意义通过直接体验作品以及通过作品的观察角度而获得理